

京口古代市井文化管窥

殷光中

元《至顺镇江志》中记载京口有“大市、小市、马市、米市、菜市”。清代方志中载有“中市”。除大市、小市今之方位明确外，余皆不详所在。其时代先后，今人知之既少，而传说讹误亦尝有之。

近几年，镇江古城考古所在对镇江地下文化遗存作抢救性发掘中，发现了市和井的许多遗迹，并伴随出土了“市井之臣”的大量遗物。尽管这些发现，相对古人的丰富遗存，尚属一鳞半爪，但仍然可以联系起来，勾勒出古代镇江市井文化的一个大致轮廓。

一

据《青云门群盛大厦工地考古工作报告》：“93QQT1 第九层为夯土墙遗存，夯筑在第十层之上，……它大致呈东西走向，现残宽3.5米左右，东西两端分别延伸在探方墙壁之内，发现长度9.5米，东端残高约0.9米，西端略高为1.1米，墙垣土质坚硬，系用黄土与灰褐土拌杂，人工夯打而成，夯打规正……。”

上述夯土墙垣，地处元代以前即称的小市，“有关专家根据其夯筑状况、走向、规模以及与周围遗迹、地层关系推测，应是南朝坊、市围墙遗存。”

颜师古曰：“市，交易之处。”人口聚集是其最大特点。江南之市，其源甚早。《吴越春

秋·王僚使公子光传》曰：“光欲谋杀王僚，……阴求贤，乃命善相者为吴市吏。”又云：“子胥之吴……行乞于市……，吴市吏善相者见之……。”这里多次提到人口聚集的“市”和管理“市”的“市吏”。

六朝以降，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，促进了“市”的发育。如南京，“大市有二：吴大市在今朝门外大市桥，旁有小市口，宋永初中大市，今羊市桥，在天津桥西北。”^①又扬州，据梁人任昉《述异记》言：“扬州有蛟市，市人鬻珠而杂货蛟布。”都反映南方地带“市”的发育已经成熟，不仅有大市、小市之称，而且还有专营某一种或数种商品的专业市场。

京口经东吴时期的经营，城池已稍具规模，吴大帝孙权曾筑“周回六百三十步”的铁瓮城^②。东晋元帝以降，北方人口大量南移，晋陵郡侨郡十八，由郗鉴加筑京城^③。其后，“王恭更大改创”城宇^④。1985年在铁瓮城之东的花山湾发现晋陵罗城，其周长约十里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，居民的生活需要之增长，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的发育。小市地处铁瓮城垣南侧，东靠罗城，西面有关河贯通南北，是理想的交易之处。官方为租税之利，从便利管理出发，建立坊市制度，势在必行。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说明这里是官方设置的最早的“市”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青云门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有个值得注意的奇怪现象。在地层中南朝文化堆积颇为丰富,“而到隋唐时期,其文化堆积则为一间歇期”,至“宋元时期,遗物含量最为丰富。”

笔者认为,这一现象说明,随着隋代大运河的开凿,“市”的中心已向西转移,逐渐为“大市”所取代,遂有“小市”之称。小市,相对大市而言。杜甫诗《题忠川龙兴寺院壁诗》:“小市常争米,孤城早关闭。”可为“小市”之写照。从镇江地名的变迁看,隋唐之间,此间似形成为柴米市,或兼经营朝市、夕市民众食品之类,规模既小,流动性也大,自然就无文化堆积可言,宋代以后,“市”与民居混为一体,故“小市”宋元时期遗物含量最为丰富。而柴(草)、米、油之类的市场,渐沿关河向南推移,今南门大街有元以后之“柴米街”,其东有草巷、花巷,西有油炭巷(今尤唐巷)等地名可证。

二

据《大市口商城工地考古工作报告》:“TJ1的路土,从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探井来看,这种路土也非民居中走路形成的,它可能是唐代构筑镇江城的某条主要干线或支干线。”

“Z1Z2不是一般居民所用的灶台,它们应该含有窑腔的性质,数年的考古资料证明,现代大市口在唐代就是商业交通的枢纽地带,……因此,Z1Z2应该是手工业作坊铺中使用后遗留下来的遗存。”

这两处遗迹发现于大市口西北角的镇江商城工地。此处古称大市,而始于何代未详。

按《周礼》:“三市:曰朝市、曰大市、曰夕市。”《周礼·地官·司市》:“大市日昃而生,百族为主。”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述东晋以后

“淮水北有大市百余,小市十余所,大市各置官司,税敛既重,时甚苦之。”由此可见,大市具有官置、经营时间长、范围广、品类多等特点。并且除了税收之便以外,尚有其他用途。

最多见的是用于行刑,如:“尚至楚就父,俱戮于市。”^⑤

“要离乃作得罪出奔,吴王乃取其妻子焚弃于市。”^⑥

“传首西台,暴尸建康市。”^⑦

“斩刘归义、徐嗣彦、傅野猪于建康市。”^⑧

又可行丧典,如吴王阖闾爱女胜玉死,“乃舞白鹤于吴市中,令万民随而观之。”^⑨

又可检验并禁用劣钱,如隋时,“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,皆令之榜,置样为准,不中样者,不得入市。”^⑩

京口大市始称于何时未详,据《唐书·路随传》“随为润州参军,李琦欲困辱之,使知市事,随怡然坐市中,一不介意。”是为润州置大市之证。按唐之官制:“中都府上州,皆有市令一人,从九品,掌市廛交易,通判市事。”^⑪路随(776—835年),据其经历,以参军知市事,当在唐德宗之时。

与小市口隋唐时期文化堆积为一间歇期截然相反,大市口商城出土隋唐遗物则特别丰富,亦足以证明前者衰落之日,正是后者崛起之时。

一般认为,封闭式的坊市制度传自北魏。据近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,市的“东西南北四面都开有宽敞的门户,中间有宽大的十字街”,似乎也不尽然。但东汉迄于唐,长安均行东西两市制度,六市在道东称东市,三市在道西称西市。北魏的洛阳城始见大、小之称。其西廊称大市,东廊称小市,这一点是

与京口相似的。北魏洛阳实行“市”和“里”相结合的“大市”制度，市的周围设八里，每面两里，市居其中，居民按不同行业分居市外各里。其东通商、达货两里，居住手工业者、屠夫和贩卖者；南面调音、乐律两里为妙伎和卖艺人所居；西面是退酤、冶觞两里，以酿酒为业；北面是慈孝、奉终两里，以制卖棺椁和出租丧事用车为业。据宋《嘉定镇江志》，京口“城内七坊，曰崇德、曰践教、曰静宁、曰化隆、曰还仁、曰临津、曰太平，皆仍故号。”但其称始于何时？方位何在？均未确指。《至顺镇江志》所列各坊方位明确。大市之北为至孝、孝感两坊；大市之南为文昌坊，与洛阳城大市北的慈孝、奉终两里和南的调音、乐律两里，名虽异而意实同。而其西为会通坊，与洛阳“市”东之通商、达货两里意同而位置相反；其东为善济、仁安两坊，有歌功颂德的含意。据文献记载，位于东南方向的酒海街，宋时为酒库之所，今在酒海街附近发掘大量的贮酒器，证实此处以酿酒为业，则适与洛阳相反。再从唐长安的东市看，其北胜业坊多居倡伎，西北之崇仁坊以制造和修理乐器为业、又与洛阳完全相反。诚然，三地市坊的设置略有先后，但仍可见各地的坊市制度并不完全统一，各地都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做法。

随着市场发育的成熟，各类专业市场逐渐形成。我们可以从镇江地名沿革看到一些痕迹。《嘉定镇江志》言：坊巷中“又有以居人所鬻之物，猥以为名。”历代镇江方志中罗列这些巷名，有些可以追溯到宋元以前，如大市口之北有果子巷、磨刀巷；南有汤团巷（今白莲巷）；西有竹竿巷（今中山路西段）、腰带巷（今腰刀巷）。元代以后，其东有剪子巷、梳儿巷、网巾桥，东南有石头巷、箍桶巷（古通巷），

这些巷名都是因市物或劳务而命名。未注今名者至今仍然沿用。此外，今日之中街，位于大市与小市之间，当是由早年的“中市”转化而来。中街口镇江盐业公司和镇江市房地产教育中心的发掘，证实中市在隋唐时期商业繁荣，从而取代了小市。其名称似晚于大市和小市。

三

有市必有井。《风俗通》曰：“俗说市井，谓至市者当于井上洗濯，其物香洁，及自严饰，乃至市也。”明人王圻撰《三才图会》绘市井图，在市的入口处有一井，与《风俗通》所谓是吻合的。

京口以“井”为名之地颇多。据文献，宋以前有大井巷、小井巷，今均不知其所在，井何以比较大小，笔者疑是大市井与小市井之简称。元以前有井子巷（今宋官营）、双井巷（今西府街，双井路因此得名），这些井都是与“市”有着密切关系的。

镇江城市考古中曾发现多处水井，大多位于干道左右。其中解放路万古一人巷口井、城隍庙街东井在施工中暴露，未经科学发掘，发现了一些宋元陶瓷标本。大市口西北镇江商城工地水井系挖土机挖土时发现，出土大量钱币，考古所征集到的仅占小部份，经清理，近300枚钱币多为宋钱，其下限为南宋宁宗嘉定年间（1208—1224年）所铸“嘉定通宝”。可以推测为宋井，当是元人南下时，邻近商户倾倒入井的。南门大街东井大约经过掏修，未发现成形器物。大市口东南角供销大厦工地水井，按层逐步清理，出土300余只汲水的陶罐和一些木吊桶的残板，以及打捞桶罐用的铁钩。还发现一件元末农民起义军韩林儿龙凤二年（1356年）的秤砣，都证明井与市

的密切关系。虽然这些水井的时代多在宋代以后,似与各“市”有南朝、隋唐地层无直接关系,但这些水井都地处要道口,其前当有土井或简陋的砖井,宋以后的井是在原地重建的。从“市”与“井”的方位和布局看,仍然有早期市井的影子。

四

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各类器物,证之以文献,可以大致了解古代京口市井文化的一般状况,今择其要者介绍于下:

一、丰富的酒文化。出土较多的罐、壶、盏等酒器。谈到酒,地方志常引晋人桓温“北府酒可饮”之语。唐诗人杜牧有“绿水桥边多酒楼”之句。解放北路拓宽工程和工商银行的发掘,出土了唐代地下木构水道和独木舟,以及大量宋代的黑陶盏。一般认为,黑盏为斗茶之用,当然也可以用来饮酒。《嘉定镇江志》记载:“淳熙五年,丹阳县一妇人为盗所杀,两弓以求盗自任,跟踪可疑少年,至扬子桥与少年遇,固邑里素相识,乃邀诣道店买酒与饮,酒人持陶盏四只设于案……。”《至顺镇江志》记述了京口酒楼之兴衰云:“宋熙宁十年以前,天下诸州酒课岁额自四十万贯以上至五千贯以下为九等,润止六务,岁额五万贯之上,南渡以后,军费浸广,而润之酤利浸增,库务楼店,各有所隶,曰本府也、总所也、戍司也,皆彩旗红旆妓女数十,设法卖酒,笙歌之声,彻乎昼夜。”统计当日官办酒库 14 处,另民间酒库 28 所,而元代以后无一存者。宋代僧人仲殊《南徐好十词》,有两首提到绿水桥:“绿水画桥沽酒市,清江晚渡落花风。”“南北岸、花市管弦声,邀客上楼双榼酒,戍舟清夜两街灯,直上月亭亭。”解放北路万古一人巷地处当日绿水桥,地下木构水道、独木舟和大量黑

盏的发现,证实诗人并无虚夸之词。南宋时京口酒不仅供应本地,而且外销。《武林纪事》列举杭州出售的名酒,并注明其产地。其中列扬州、苏州、常州各一种,南京两种,而列出镇江酿造的有“第一江山”、“北府兵厨”、“锦波春”、“浮玉春”等四种之多。此外,制酒的酒药亦为京口一大特产,销往各地以至京师,镇江俨然是南宋时的制酒中心。

二、陶瓷的集散地。京口因江河运输之利成为陶瓷器皿的集散地。在靠近关河的人防工地、中房工地的发掘中,南朝地层发现大量完整的陶瓷器,在大市口商城工地的隋唐地层中有成堆的破碎陶瓷片,内外烧垫痕迹仍在,似乎未经使用,而是运输途中破损而丢弃的。不同时代的陶瓷器皿,分别来自宜兴,江西清江,浙江上虞、德清,湖南长沙,还有北方定窑和邢窑的产品。

三、淳朴的民俗文化。在“中市”范围的发掘中,多处出土陶瓷或泥制的儿童玩具,在骆驼岭、中街口都出土铭有平江府匠人姓氏的泥人。《夷坚续志》称:“临安风俗……多买平江泥孩儿,仍与邻家,谓之土宜像。”中街临近城隍庙,民俗文化的兴旺大约是中市的独有特色。

参考文献:

- ①《同治上江两县志》撰佚。
- ②④《至顺镇江志》第二引《輿地志》。
- ③《晋书·郁莹传》。
- ④《吴越春秋·王僚使公子传》。
- ⑤⑨《吴越春秋·阖闾内传》。
- ⑦《梁书·侯景传》。
- ⑧《陈书·高祖纪》。
- ⑩《隋书·食货志》。
- ⑪《唐书·职官志》。
- ⑫参见杨宽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。